上津云客户端
看往期电子报

TIANJINDAILY | 天津日报
2026年10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:宋珅 美编:王宇 E-mail:wyzk@tjrb.com.cn

何以副刊

编者按

近日,著名作家王蒙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撰文,点明主流副刊当兼具郑重与轻松、温度与锐度,于众声喧哗中守正发声、引领舆论。副刊的价值与未来,已成当下媒体人共同关注的命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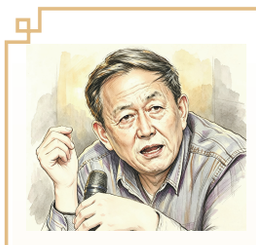
文以载道,气韵“新声”。副刊不“副”,在于以文化人、润物无声。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自1949年由孙犁先生参与创办以来,七十余载弦歌不辍,坚守“文学净土”,深耕现实主义创作,扶植文坛新人,记录时代风貌,成为全国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副刊品牌之一。

为应答时代命题,本报现推出“何以副刊”专栏,立足副刊本源,回望办刊传统,探寻党报副刊的时代价值、文化使命与传播之道。以笔墨观照生活,以文字沉淀思考,以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更鲜活的时代表达,擦亮党报文艺副刊品牌,赓续传承津沽大地的文化底蕴。

首期以专版形式推出,敬请读者垂注。

我与副刊

蒋子龙



我的文字第一次印成铅字,是1959年9月底,在《天津日报》头版左侧,直上直下的一长条。我所在单位在2500吨大型水压机上成功试制出重型五拐曲轴。我亲历全过程,写了篇2000多字自以为是散文的东西,当时不知道报社还分副刊部、新闻部等,信封上只写了《天津日报》。幸运的是,编辑们发现了这篇自投稿,把我费尽心思写的形容词、议论以及颇为满意的文学表述全删掉了,只保留了基本事实,改成一条消息发了出来。在消息的末尾有个括弧,括弧里面有三个小字:蒋子龙。实际上不是我稿子写得好,是我报道的事实太重要了。

当年,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,若想踏上写作之路,或想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远,似乎就得找到报纸副刊。副刊是文学园地,发现并扶持作者;副刊也是文学高地,能提升作者的写作水平,因为副刊也是名家荟萃之地。文学原本就是社会的镜子,副刊的本质是文学,既要灵活明达,又要文笔优美,适应读者思想和情感的需求及社会的变化。自报纸副刊诞生以来,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,都曾是副刊的“铁杆儿”撰稿人。当时的副刊成了报纸的招牌。

但是,一个尚未入门的文学青年,想要“找到”副刊并不容易。1961年秋天,我已经是海军制图员,写了篇小说,完全虚构,讲一个海岛上驻扎着海、陆、空三个战士的故事,题目是《西瓜熟了》,寄给了《人民海军》报。部队有个规定,每天晚上有半小时的集体读报时间。某一天晚上,全部队官兵在《人民海军》报第一版的右下方,看到了一篇加花边发表的通讯《西瓜熟了》。我的名字署在标题下方,很醒目。部队哗然,说我“瞎编”!我当即被叫到政治部,黎干事对我好一顿批评,幸好当时没有稿费,才没有给我扣“名利熏心”的帽子,只说我胡编乱造,影响很坏。我申辩说自己写的是小说。黎干事质问道:“你跟报社说明是小说了吗?是你瞎编的,冒充通讯,欺骗报社、欺骗全军!”

这顶帽子够大,也预示着我今后的写作之路将布满荆棘。但喜好写作如吸烟、喝酒上瘾一样,有了感觉,冲动上来,就要形成文字。写出稿子我不敢再寄给军报,转投《天津日报》《天津晚报》,都是短小的散文、随笔之类,偶尔会被采用见报,最重要的是收到了编辑的回信。跟编辑有了联系,才真正“找到”了副刊。

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的李传琅是老大姐式的编辑,亲切、爽直。记得她第一次约我见面谈稿子,开门见山地说:“这篇稿子中就是这件事、这个观点是新鲜的,别人写不出来,我就看中这一点。其他都是废话,能减就减,能删就删。”《天津晚报》副刊的达生,原名生寿凯,身材高大,人们喜欢喊他“大生”,久而久之,他索性写文章就署名“达生”。他谦谦君子一般,温雅、和煦、渊博,给我的感觉跟晚报副刊的风格极为一致。

我跟他们的联系持续终生。至今想起来还颇为愧疚的是,他们到工厂看我,我不能留他们吃饭。我的工厂在北郊,从东北角乘18路公交车,在马庄下车后,还要走一公里到厂门口,从厂门口到我的车间还有千八百米。厂子大,车间也大,带他们看完主要车间和设备,就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。对李大姐我不敢硬拉,我是强把达生往食堂拉,他保持着微笑却坚决拒绝,我只好陪他来回走四公里,将他送上18路公交车。

其实,所有到厂里找我的朋友,都要吃一顿饭,也包括天津和北京来的杂志或出版社的编辑。工厂大食堂的饭非常简单,四分钱两个馒头,两角钱是最好的菜,大桶的汤随便喝。

这可能是副刊编辑一脉相承的作风。许多年之后,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的宋曙光,一次次骑着自行车到东丽区的作者家里谈稿子,不管刮风下雨,谈完稿子就走。他还将业余作者的长篇小说,推荐给出版社。东丽区曾出现过一个水平整齐的作家群体,这跟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的长期扶持有关。今日《文学自由谈》的主编狄青,即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。东丽区的“文学教头”赵宝山,每每跟我谈起宋曙光就动容、动情地挑起大拇指。

副刊可以改善一方作家的生存状态。作家们可以在报纸副刊上聚集,风致宛然,妙趣高雅。城市风情,人文菁华,文不负心,意兴洋洋。倘若没有日报和晚报的副刊,天津几代作家的生存状态,是难以想象的。

“文革”期间各报副刊消失,待到副刊恢复,我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了小说上。直到1992年,多次编发过我书稿的肖关鸿正主持《文汇报》副刊,约我开个专栏,一周一篇,两千字以内。禁不住他的滔滔说辞,再加上我肚子里有很多写小说用不上的“边角料”,正好可以写成短文章,我就答应了,自以为一周一篇短文,是很轻松的事。

第一篇《小人效应》,编辑怕惹争议,将其放在副刊最不起眼的右下角。发表后很快接到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张胜友的来信,他说将此文复印了16份,挨个办公室散发。后来在北京碰到李国文,他甩出一句:“你有经典。”我一愣:“什么经典?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《小人效应》。”他们大约都是吃过小人的亏,那篇短文尽管很肤浅,根本没有篇幅展开,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。

还有一篇《寻找悍妇》,调侃一个大学副教授征婚的故事,竟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,其中还有几位女士的信,信中附有她们的简历和玉照,希望我能将她们介绍给文中讲述的那位单身副教授……最令我想不到的是,老领导、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友余,亲笔来信“走后门”,让我把文中那位副教授先介绍给他认识的一位姑娘……如此这般,给我很大激励,一篇信笔由心的短文,竟不比一篇精心构思的小说影响小。

肖关鸿催稿有方,他不打电话,下班后优哉游哉地给我发一个加急电报。当时的加急电报要求在六小时内送达,从上海到天津正是半夜一两点钟。邮递员的摩托车嘟嘟嘟地冲进我住的大杂院,然后高叫一声:“蒋子龙电报——拿戳儿!”随即,大杂院里人醒狗叫,没人往好处想,肯定是认为作家协会或我的老家出什么大事了。

第二天,邻居们纷纷打听,我说是编辑催稿,人家都不理解,也不相信,好像我不敢说实话。越是不说实话,就越证明不是好事。有这么两三回,我不敢再拖拖拉拉,宁可暂时放下小说写作,也要如期交卷。于是,就开辟了我创作的第二副笔墨,大量写起了散文、随笔,一写就是三十多年。

我曾给许多报纸的副刊写过稿子、开过专栏,短的一两周,长的数年。久而久之,对报纸副刊也有了切身体会。副刊体现了报纸的一种文化形态,协调着媒体与生活、人生、艺术的关系。副刊的文字因承载现实而真诚,因坚守着文化品格而需精美,因能兼容、能担当、能凝聚而丰富有趣。副刊上的文章题材广泛,提供真情,提供一点思想、一点智慧,乃至一点事实。这正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,最为灵活便捷地反映了现代人掩藏在散漫外表下的紧张、浮躁等情绪。

所以,一个作家倘若不写副刊文章,便很难跟这个社会交流,也很难说他关注现实。因此,想要写好副刊文章,就需大量读书,查阅不计其数的资料,决不以想象代替事实和论据,是副刊锻炼了我的敏感度和笔力。

我为副刊写的文章,有的得了奖,有的挨了批。无论是褒还是贬,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天地,锤炼了我的思想和文字,使我受益终生,由衷地感谢报纸有副刊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天津市作家协会原主席,曾获“改革先锋”称号)

副刊之忆

宋曙光



但凡编过副刊的人都知道,报纸副刊工作的流动性很大,能够在岗位上坚持下来不容易。那些年,副刊编辑常会被调来调去,新分配到报社的年轻人,都要先去记者部锻炼,然后才能有机会调到文艺部当编辑。

我刚到天津日报社工作时,是1975年,在从事文字工作之前,先要与铅字打交道。排字师傅都是有文化的,他们比拼技术,忘我工作,且对文字有着超强的识别力,无论发排的原稿有多乱,他们都能准确、快速地拣出铅字,令人钦佩。我就是从师傅们口中,听到了有关报社的历史,还听说孙犁就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部。一想到每天出版的报纸,都与排字车间有联系,手中那些小小的铅字,便瞬间有了分量。

在熟知报纸印刷流程之后,我被调离排字车间,拜前辈副刊编辑为师,开启了报纸副刊编辑生涯。没过几年,我也像其他副刊编辑一样,手提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,去排字车间拼版了。我的这份副刊情怀,自此被深深地埋进了心里。

在调往文艺部之前,我已经在副刊版面上发表过诗歌作品。那是我的处女作,一首16行短诗。令人难忘的是,这首诗是我在排字车间,看着它从排字、拼版、压纸型,到最后被装上轮转机。转天清晨,我下了夜班就直奔收发室,拿到了新印出来的报纸,在副刊上看到了署有我名字的诗歌。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,多少年过后都难以忘怀。

这便是我与报纸副刊的缘分。我从排字车间走出来,闻过那里的油墨香和纸张的清香,后来又在副刊园地感受到了孙犁笔下的荷香与苇海。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之后,每期的“文艺周刊”,我都会去排字车间拼版,从小黑板到版式纸,再到激光照排,直到很多年后,铅字作业被数字化所取代,可我的脑海里,还总是时不时地冒出铅排时的腰栏和栏宽数,想起老副刊人的严格要求——副刊要“薄皮大馅”,版式“不能贴饼子”,“活儿与活儿(即段与段)之间要相互咬合,不能通直缝子”……这都是经验之谈,细想起来都很有道理,记住了副刊版式的这些规矩,也就记住了前辈编辑的良苦用心。

副刊版面不同于新闻版,要突出副刊的特色。报纸除了新闻之外,还辟有专刊与副刊,副刊又细分为综合性副刊和文学性副刊。《天津日报》创刊时,第四版便是“副刊”,属于综合性副刊,随后创办的“文艺周刊”,便是纯文学作品版,每周一期,以刊发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为主,兼发与文学相关的评论。



“文艺周刊”在创办伊始,便制定了办刊方针,注重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,以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,树立了党报文艺副刊的优良范式。当年留存的记载虽然有限,但郭小川、方纪、孙犁三位创办者,都曾为新生的“文艺周刊”辛勤耕耘。在刚刚解放的天津,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,常常忙到深夜才回家。郭小川、方纪相继调离后,孙犁留在了副刊,全面主持“文艺周刊”的工作。

1979年1月,“文艺周刊”复刊,由我负责相关的编辑工作,需要一切从头学起。我将孙犁前辈的一些著述,特别是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文章,当作自学教材,一心想做一名称职的编辑。孙犁在我的心目中,是一位和蔼可亲、善解人意的老人,对年轻编辑的心愿,从来都尽力满足。我每次登门看望,总会提出一些请求,他都欣然应允,从不让我失望:他为我开过学习书单;替我亲笔写过多封给诗人的约稿信;帮我修改过一篇作家专访的原稿……每次见到我,他都要问起“文艺周刊”的来稿情况。

1983年,“文艺周刊”出刊1000期时,孙犁写了一篇文章《我和〈文艺周刊〉》。主编李牧歌和我一起到孙犁先生家里,当面请他为“文艺周刊”千期纪念写篇文章。孙犁答应了。他的支持是对“文艺周刊”工作的充分肯定,同时,也说明“文艺周刊”在他心目中的分量。

孙犁的这篇《我和〈文艺周刊〉》,对于报纸副刊界来说,影响极为深远。文章中提出的五点办刊希望,是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总结,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我将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,夹进书册里,当作副刊工作的准则。

我常常督促自己,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看稿,要多走出去联系作者。我曾骑着自行车到丁字沽找过作家王家斌;到小海地找过诗人鲁藜、林希;到高层住宅楼里找过吴若增、阿凤;在冯骥才家,与他坐在整面墙都是书柜的起居室里聊天……前两年,我还到滨海新区参观“蒋子龙文学馆”,回来后写了一篇长文《文字之交——我和蒋子龙先生的交往》,讲述了我们几十年交往的故事,情谊浓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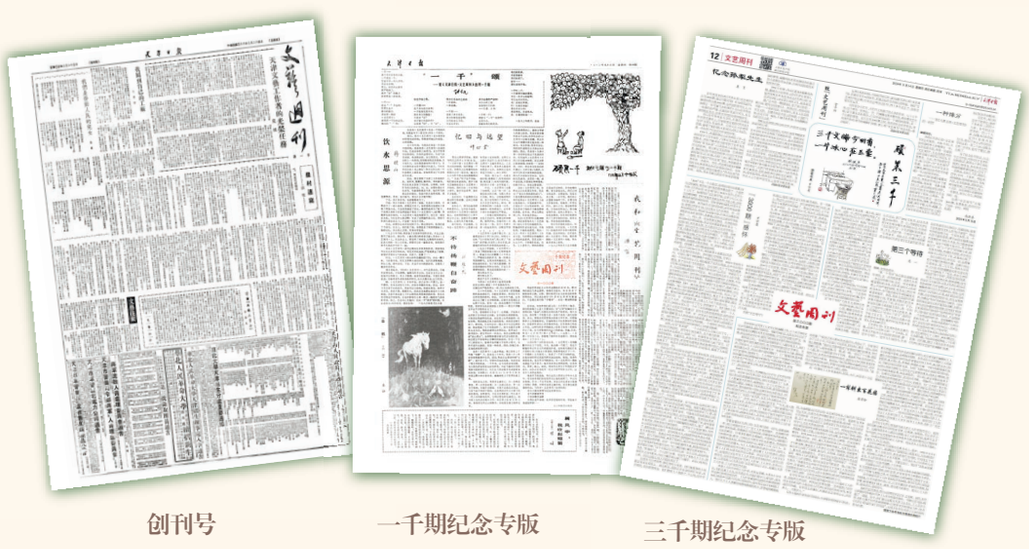
副刊编辑走出去,与作家朋友交流,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。作家们大都睿智、通透,有超强的记忆力,每深谈一次,都是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,可以开阔思路,增长见识。从交往中还可了解作家最新的创作构想,便于日后约稿。

我在“文艺周刊”做了三十多年责任编辑。“责任”二字体现的是责任心和责任感,编辑只有有心、用心,才会产生爱心,全身心地投入副刊工作。我是由李牧歌带入行的,她和邹明都是孙犁的老同事,也是“文艺周刊”前辈编辑的优秀代表,我深受他们的教诲,不能辜负前辈的期望。

前些年,我为“文艺周刊”的老朋友、老作家写过多篇回忆文章,如柳溪、孟伟哉、舒群、魏巍、刘绍棠等;约请作者为去世的杨润身、吴若增、颜廷奎等写过悼念文章,并在每篇文章后面加上“编者附记”,以表达怀念之情。近两年,回想起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中的诸多往事,我写了多篇散文,如《粉笔之忆》《铅字之忆》《书信之忆》《纸墨香不散》,还有一些关于编辑素养与修为的文章。这些文字,无一不是在写“文艺周刊”,写前辈孙犁——我是想留住那段峥嵘岁月,为后继者留下老一辈编者的身影和足迹。

岁月证实,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。传统不能丢,文脉不能断。纸媒与书籍一样,凭借文字而存在、而传播。文字不朽,纸质媒介就在。《天津日报》的报名永远响亮,“文艺周刊”这块园地,也依然会春风化雨,花色常新。

(作者系《天津日报》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,高级编辑)



创刊号
1949年3月24日第4版

一千期纪念专版
1983年5月5日第4版

三千期纪念专版
2024年11月14日第12版

我文学创作的起点

李治邦



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的,当时我在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曲艺编辑,还不到三十岁。其实我在部队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了,只不过没有发表过作品,都是在笔记本上写的小说,然后读给战友们听,他们传着看。听到战友们谈论我的作品,我当时很激动和骄傲。后来从部队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任编辑,就是靠着这些笔记本上的创作进馆工作的。

说起发表作品,还是从《天津日报》的“文艺周刊”开始的。我当时订了《天津日报》,每周都看“文艺周刊”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将第一篇小说投了过去,每天都等待着发表的消息。

一个月后,编辑回复我,说小说可以发表。我当时竟然觉得这个消息不是真的,那种既想相信、又忍不住怀疑的心态,让我觉得像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。后来,当我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看到我的处女作,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,反复看了好几遍,发现有不少地方都被编辑修改过,就像是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,被修剪成了挺拔秀美的样子。

从那之后,我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直到现在,四十年过去了,我每年依然会在《天津日报》的“文艺周刊”发表一些小说和散文随笔。如今,我已在全国各地刊物发表作品,但这不会影响我对“文艺周刊”的感情,尽管“文艺周刊”换了多位编辑,但并没有改变当年的初心,依旧热心扶持作者,做作者的贴心人。记得我的一篇八千字的小说《关于我爹和鸟》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后,《小说月报》予以转载,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。我和“文艺周刊”的编辑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,对这篇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复盘,它好在哪里,不足在何处。那次对话,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
“文艺周刊”是一个讲宗旨的地方,那就是接地气,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,让读者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音。可能我的文学创作与“文艺周刊”的宗旨相近,那就是鼓励有时代精神的人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、追求理想的人。“文艺周刊”是一个很活跃、有生气的版面,每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,比如,曾举办过多次津味小说征稿活动。天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城市,是九河下梢的文化码头,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,提供给作者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。天津人那种独特的性格、乐观向上的气质、豁达包容的心态,也成为作者的灵感源泉。每次的津味小说征稿活动,都吸引了很多作者参加,甚至是外地的作者,他们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,写出了津味小说的特色。我曾创作了一篇小说,写的是小时候在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的生活,写了童年的记忆,写了邻里之间的深厚感情,还写了那些懵懵懂懂的爱情萌芽。我也写过很多反映吴家窑大街九号楼生活的散文,那里虽然是楼房,但有着天津大杂院的典型生活形态,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,只在天津才有的市井风情。



换一个角度说,“文艺周刊”也是一个注重创新的地方,那就是鼓励写作者创新,以新的创作姿态和生活状态,反映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,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阅读。它既可以让你怀旧,也可以让你出新,给你铺好路,任你驰骋。

“文艺周刊”也是天津作家们互相交流的地方,作家之间很少见面,但经常能在“文艺周刊”上“打照面”。天津有个作家叫王筠,很有才华,看到他在“文艺周刊”发表的作品,我就对他产生了兴趣。王筠是一位写津味小说的高手。后来,我们经常见面,聊的话题就是他的生活和写作方式。“文艺周刊”成了我们之间联系的桥梁。后来,我在“文艺周刊”读到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,写的也是天津的生活,很感人,但没有想到会是他的绝笔,他已因病去世了。当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,我很痛心,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还有马林,也与王筠一样,是“文艺周刊”的忠实作者,热衷于津味小说的创作。他因病去世后,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。“文艺周刊”就是这样,看着一些作者离去,又有一批新的作者加入。

算起来,我也是“文艺周刊”的老作者了,看着它从老编辑传到新编辑手中,代代相传。编辑们的脾气秉性虽然不同,风格却出奇地一致。他们都会走访业余作家,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孙犁老先生的遗风。一张报纸的副刊就是读者的心灵窗口,从“文艺周刊”到“满庭芳”,刊名虽不一样,却是一脉相承、薪火相传。

(作者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,研究馆员,三次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)

雅正承文脉 报尾有山河

刘卫东



一份报纸有多个版面,分别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,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叫“副刊”。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,副刊指的是“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、学术论文等的专页或专栏”。相对于时政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的“刚”性内容,副刊明显是“柔”的。从类型来看,它代表的是“文化”,是“正刊”的补充和延伸,形成了报纸内容的刚柔相济。从逻辑上来说,正与副是相辅相成的概念,没有“副”,何来“正”?所以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以来,副刊虽然有“副”字,但从未被小觑过。一份报纸的人文高度与其副刊的质量密切相关,副刊实则代表了一个时代和一份报纸的文化水平。

之所以谈起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下的“副刊”,是因为最近关于它的讨论。先是92岁的王蒙先生,于9月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发表了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一文,用南朝谢赫论画的“气韵生动”的概念,提出了对副刊的要求。石子投入湖中激起涟漪,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重要媒体相继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副刊的重要性,并对其当下状况、走向作了论述。为何此时副刊得到了青睐?我认为是副刊本身具有的“承传”作用和“雅正”美学。“承”指的是它承接着时代主旋律的音符,具有与生俱来的教化责任,是引领一个时代风尚的“发布会”;“传”则是传播和传递,副刊可以依靠独有的“趣味”,使上述文化内容更为鲜活、更易接受。在以手机屏幕为王的新媒体时代,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容易偏移,新奇怪诞的内容往往更引人注目,在此时,副刊则发挥了“雅正”的作用,以风格古朴、格调高雅的特质,成为最适合大众接受的美学范式。

那么,问题就很清楚了,现在讨论的看似是“副刊”的问题,实则呼唤的是一种美学精神。当下文化的多元和杂糅是历史上空前的,以手机为载体的信息洪流足以占据个人的大部分时间,这也引发了注意力竞争;与此同时,此前副刊的“文化”功能也被分流到各个方面。短视频里,历史地理、人文趣事、生活巧思等经常出现在副刊中的内容被具象化呈现。

副刊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中该如何办好,读者又想要看到怎样的副刊,就成为新的问题。

鉴古知今。作为当代副刊名片之一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其历史经验就值得借鉴了。吴志鹏博士在《独树一帜的党报副刊——1949年的〈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〉》一文中考证,创刊于1949年3月24日、目前出刊三千多期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,是新中国持续刊行、历史最为悠久的党报文学副刊之一。在它长达七十多年的办刊史中,有许多“故事”可以照亮今天的道路。

首先它始终与现实共振,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居“报尾”而向“潮头”》一文中,在谈中国报纸副刊“很早就建立了关注现实的传统”时特意提出两点,一是“鲁迅先生以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为园地”,二是“孙犁先生主持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”。由此可见,这两个副刊是现当代副刊中两张重要的名片。“关注现实”这一概念容易解释——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塑造“现实”,而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在这方面恰有可以一说的独到经验。

把副刊办出自己的风格,是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历史经验,它离不开孙犁作出的贡献。孙犁深知副刊“雅正”的特点,因此有意把“文艺周刊”定位为“一处苗圃”,用独有的视角回应、引领了时代的风潮。上世纪50年代,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发生巨变,孙犁作为副刊的主要负责人,特别注重选用以细腻的抒情笔法书写农村变化、新人新事的作品,于是在他的影响、培养之下,年轻的刘绍棠、从维熙、韩映山、房树民等,频频发表小说并在文坛受到关注,风格相近、声气相通,日后被文学史概括为“荷花淀派”。可以说,他们都是在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,这在当代报业史上也是一段佳话。

形成自己的传统,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怀,也是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自觉追求。建立传统是一个问题,延续下去则是另一个问题;通常形成一个风格需要一代人的开拓,而将其延续下去,则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。这就需要从业者的使命感——2019年是《天津日报》创刊70周年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》出版,该书主编王立文在序中说,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“不仅见证一份报纸的似水流年,更流经时代的山川河海,流经我们的情感脉络,澎湃起伏,生生不息”。看似小小的副刊,竟然有着超越时代、汇聚人文的情怀。这种以“副”为“正”,让副刊堂堂正正。

(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文艺周刊
第三〇九九期